



“文化中国”与东南亚汉学研究丛书

主编 金进

理学、家族、地方社会 与海外回响

Neo-Confucianism, Lineages, Local Society,
and Echoes from Abroad

许齐雄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理学、家族、地方社会 与海外回响

Neo-Confucianism, Lineages, Local Society,
and Echoes from Abroad

许齐雄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学、家族、地方社会与海外回响 / 许齐雄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7-308-19361-0

I. ①理… II. ①许… III. ①理学—研究—中国—明代②家族—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③儒学—研究—新加坡
IV. ①B248.05②K820.9③B33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47791 号

理学、家族、地方社会与海外回响

许齐雄 著

-
- 责任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金晓刚 蔡帆
封面设计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361-0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从思想史说起

齐雄教授的新著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来索数言，以为代序。考齐雄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起家，近年发展，已经摆脱过去，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过去学术界对思想史的研究，有颇多不同的意见。以往谈到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一般都会举20世纪50—60年代侯外庐主编的经典巨著《中国思想通史》。我的学生年代，对思想史的认识，是从钱穆、侯外庐开始的。“文革”期间中国内地的书籍流通不广，香港盗版的精装六大册《中国思想通史》，是我大学时期时常翻阅的读本。但侯氏《中国思想通史》对中国思想史的范围和界定没有明确的说明。在不到两千字的“序”中，编者开宗明义地交待了该书的内容和特点：“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显得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因此，我们的研究只是初步尝试的性质，虽然曾用了些功夫，但不敢说对中国民族丰富的遗产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侯外庐的“序”表明他们的中国思想史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我当时就想：这是不是“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和研究方法的学理要求？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后，半个世纪以来，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来说，一直处于领导的地位，形成所谓“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版的《中国思想通史》，重新肯定其在国内的学术地位。有些学者指出《中国思想通史》的学术价值与成就，是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熔为一炉，其思想史研究的特征是以中国学术思想自身内在发展规律为依据，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论为指导思想，借鉴西方一切积极的思想观点与方法，进行中西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当年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可以说是跨领域的。这种“垄断”现象，直至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出现，才有了新的范式转移，为过去的研究方法注入了新的元素。海外学者如狄百瑞(William de Bary)、牟复礼(Frederick Mote)、余英时等人，又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个人的不同看法，甚至形成尖锐的学术论争。怎样研究思想史？甚至什么是思想史？学术界至今对此仍然存在分

歧。思想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的兴趣和背景的影响,读齐雄的新著便不难发现这一点。他的新著的第一篇,便是谈“明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

齐雄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已经以读书、研究为毕生志业,勤奋好学,一直名列前茅,最终以一级荣誉优异成绩结业,为全班之冠。毕业后获奖学金继续留校攻读硕士,探讨近 50 年北美地区的明代思想史研究,剖析东西方学者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之后又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奖学金,被保送到海外著名学府深造,成为大学指定培养的年青一代。齐雄后来选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并以薛瑄为题,专门研究明初北方儒学,以期改变学术界对明初儒学发展的误解。但他刚到美国的第一年,即遇上美国的“911”,当时他身在纽约,难免不受影响,但他还是以读书人的心情,临危不乱,专注学业,四年后顺利毕业回国。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研究明史的重镇,20 世纪 60 年代因为主导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明代名人传》) 计划,遍搜世界各地收藏明人文集及史料,加上有 William de Bary, Robert Hymes, 王德威等名师坐镇,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环境。他在美国经过 5 年训练,耳濡目染,研究工作也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其博士导师韩明士教授,师承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对南宋以来地方精英的研究有精辟的见解,在学术界影响深远。有学者认为齐雄与郝若贝、韩明士的学风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读齐雄的文章可见,虽然他的思想史研究加入了地方史的特色,却又凸显了历史上南北差异的问题,而且,他的研究涉及的面向更为广泛。

齐雄对思想史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说:“思想史研究应该朝向哲学概念和其它史学领域(尤其是社会史研究)合作。”又认为:“既然跨学科的研究是大家基本认同的态度,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至少应该努力做到跨越史学领域的尝试。毕竟无论是哲学史、社会史、经济史、宗教史等都是史学专业的分支。思想史研究也许尚不能完成史学和人类学的合作,或者史学和地理学的结合;但是在目前社会史等史学领域提供了不少可供利用的成果后,思想史研究不宜只是继续将它们当成背景介绍来处理,而是应该考虑善加利用其方法、视野、问题等。同不同意各别社会史家的结论是另一回事。新视野的合理性并不表示旧方法一定要摒弃。我并不是主张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不能再走传统的‘哲学史’或‘概念史’的路子。只是希望可以看见更多的跨史学领域的尝试。在史学研究中自然一直会有新的主张出现;或者主张看起来不新,但是其具体的操作其实是不同的方法。”这样的看

法，可能与齐雄在新加坡所打的基础有关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许多大学的中文系不同，课程结构所强调的是文史哲不分家，任职老师来自不同的著名学府，各有专长，多元视角已经是教学、科研中的常态。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最能代表齐雄的学术地位的，是他对明初理学家薛瑄的研究，该博士论文后来在哈佛大学出版，题为 *A Northern Alternative: 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这是学术界研究薛瑄和明初儒学发展最重要的著作，在学术界评价甚高，如美国加州大学 Richard von Glahn 教授便认为该书“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Ming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corrective to the prevailing narratives of Ming Neo-Confucianism that have been solely fixated on developments in South China”，其学术成就可见一斑。

齐雄学成归来转瞬有十载，本书可以说是其过去 10 年的学术结晶。从书名到内容结构，处处反映他的研究兴趣和思路。纵览全书，主要分成四大部分，同时也是他目前涉猎的四个学术领域：理学、家族、地方社会、海外儒学。虽然各成章节，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也有数百年，但从儒学和地方发展的脉络去看，又能互相呼应，一脉相承。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史、宗族史、地方史、海外华人史的交叉互动和影响。读其书，见其人，知其学，在新书出版之际，草草数言，以志其成。

李焯然

2019 年开斋节写于狮城恣彦斋

目 录

理学研究

明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以薛瑄(1389—1464)研究为例	(3)
明初“理学之冠”薛瑄的“自振起”兼论明初北方理学	(15)
一、薛瑄的理学背景	(16)
二、薛瑄和李贤:“自振起”的延续	(20)
三、结语	(27)
薛瑄的“道统观”和“复性论”	(29)
一、导论	(29)
二、道统观	(31)
三、复性论	(35)
国家政治目的和理学家教育理想在官学与科举上的结合:以薛瑄思想为例	(38)
一、引言	(38)
二、科举/官学,以及理学/书院的对立	(38)
三、国家政治目的和理学家教育理想的结合	(41)
四、结论	(56)
河东学派:区域与跨区域的思想网络	(58)
一、跨越黄河之东:作为区域传统的河东学派	(58)
二、中分其盛:跨区域网络的河东学派	(61)
“我朝真儒”的定义:薛瑄从祀孔庙始末与明代思想史的几个侧面	(79)
一、成化、弘治年间	(80)

二、嘉靖年间	(84)
三、隆庆年间	(94)
四、结语	(100)
转变时期的金华名儒：章懋	(102)
一、前言	(102)
二、章懋生平简述	(103)
三、理学理想主义者	(108)
四、致仕后的章懋：仕途与官场	(110)
五、地方社会的参与，以及给门人的建议	(115)
六、结语	(118)

理学与家族

吴与弼的宗族观念	(123)
一、明代理学与宗族理念	(123)
二、族谱序的书写与私人网络	(128)
三、强调修谱复姓	(134)
四、重视宗族来历	(138)
五、家族的学术渊源	(142)
六、总结	(148)
理学家的思想与家族实践：李光地与安溪湖头李氏家族	(151)
一、李光地研究与明清家族史	(151)
二、明清时期的湖头旌义李氏	(154)
三、旌义李氏在清初的宗族重建	(157)
四、李光地的祭礼原则	(161)
五、结语	(172)
《清溪李氏家世学派》和李氏家学的建构	(176)
一、引言	(176)
二、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	(178)
三、从发迹到人文踵起	(181)
四、潜修亮节之士	(183)

五、明代仕宦高峰与家学端倪	(186)
六、明清之际的过渡与传承	(188)
七、不存在的《国朝编录》	(189)
八、结语	(192)

家族与地方社会

“东南衣冠之会”的背后：漳州霞中社研究	(197)
一、漳州霞中社	(197)
二、张燮作品所反映的霞中社活动	(201)
三、有关霞中社的研究	(203)
四、不平静的 17 世纪初	(205)
五、三任南路参将	(208)
六、躲不掉的明末政治	(214)
七、结论：诗社还是吾党？	(217)

论山西洪洞苏堡刘氏从清初到民国时期的六次修谱	(221)
一、修谱的传统目的	(222)
二、修谱的时间间隔	(223)
三、修谱者的身份变化和具体执行	(224)
四、修谱的新使命	(229)
五、结语	(231)

从宗谱世系图与行序探讨宗族实力：以洪洞苏堡刘氏为例	(233)
---------------------------------	-------

海外回响

实得力孔教会前期史简述	(249)
一、宏观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249)
二、20 世纪初的英国海峡殖民地与实得力孔教会	(254)
三、结语	(269)

孔教会与 20 世纪初的新加坡社会	(271)
一、社会影响与对外关系	(271)
二、宣扬孔子思想	(282)

三、《国粹日报》始末	(285)
四、“孔教”为何“教”？	(290)
五、比较宗教研究下的“Confucianism”	(294)
六、向英殖民地政府沟通的策略：孔教是宗教	(295)
七、为孔教辩护：孔教不是那种宗教	(297)
八、结语	(300)
商人与新加坡的孔教会	(302)
一、会员籍贯与背景	(302)
二、董事与方言群体	(303)
三、历届会长与主要董事小传	(310)
四、领袖的哀荣与替补	(321)

理学研究

明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 以薛瑄(1389—1464)研究为例

薛瑄(1389—1464)，山西河津人，是明代最早从祀孔庙的明儒，也是明代四位从祀孔庙的明儒中唯一的一位北方理学家。黄宗羲(1610—1695)在《明儒学案》中虽然率先确立了“河东”一派的规模，但是由于他本人对阳明学派的推崇和对明代程朱理学的不以为然，所以其对薛瑄的评价不高。黄宗羲不仅断章取义地引述了高攀龙(1562—1626)对薛瑄和河东学派殿军人物吕柟(1479—1542)的“无甚透悟”的讨论误导读者，也以“恪守宋人矩矱”总结薛瑄的学术。^①

后一断语对于后世学者影响深远，近代学者在论及薛瑄时，基本上依循黄宗羲所言。例如容肇祖虽然也推崇薛瑄“言行一致的精神”，但对于薛瑄思想的分析也处处指出其“是恪守宋人矩矱的”，“人性论与复性论，亦是宗张(载)、(二)程、朱(熹)的人性论的”。^② 陈祖武也认为“明初诸儒恪遵朱子学矩矱，守成多于创辟”，尤其是认为“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的薛瑄“所代表的这样一种为学倾向，显然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③ 王健在《中国明代思想史》中也认为薛瑄“还是谨守‘宋人矩矱’的，没有超出宋学的范围”^④。

但是薛瑄毕竟是明初理学的领袖人物，对于他的研究和评价迟早会有新的思路出现。1966年，一群美国学者先后在伊利诺伊和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两场有关明史研究的会议，会议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就是狄百瑞主编的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其中就包括了陈荣捷的文章《明初的程朱学派》(“The Ch'eng-Chu School of Early Ming”)。^⑤ 他在文章中呼吁学者重视明初四位理学家，即北方的曹端(1376—1434)和薛瑄，以及南方的吴与弼(1391—1469)和胡居仁(1434—1484)。陈荣捷是文的主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第7卷，第1a页；第10卷，第1a页。

②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天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页。

③ 陈祖武：《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49页。

④ 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⑤ Chan Wing-Tsit, "The Ch'eng-Chu School of Early 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9-52.

旨在说明明初理学不是简单地继承宋代理学,而是经历了重要的发展,锁定了新方向,并开启了后来由王阳明(1472—1529)集其大成的心学的先声。对陈荣捷来说,虽然薛瑄在太极、阴阳、理气等课题的讨论上几乎没有偏离朱熹的范畴,但是即便是被视为明初最忠实的程朱理学追随者的河东学派在两处隐晦但至关重要的地方和朱熹(1130—1200)也是不一致的。意即对薛瑄来说,“格物”行为中对外物的认知活动已经不再占据绝对的位置。而且“格物”已经不是认知心到外物上去发现理,而是本身就内含理的认知心到外物上和理取得统一。虽然河东学派不及吴与弼等崇仁学派走得那么远,却无疑也是偏离了朱熹原来的立场。^① 我们也许不一定同意陈荣捷对薛瑄理学思想的分析,但他无疑提醒了我们要注意薛瑄理学思想中的变异性。只可惜陈荣捷提出的重视明初理学家的呼吁并未引起太大的回响。

到了1984年,张岱年在一次场合上就呼吁山西学者“要重视研究薛瑄,正确评价薛瑄”。^② 其呼吁引起了山西地区的学者们的重视。不久之后,第一届薛瑄研讨会便在1987年召开了。随后,山西学者在1990年也重新校对、编辑,并出版了《薛瑄全集》。而第二届薛瑄研讨会也在同年内举行。学界最早的一部以薛瑄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是李元庆的《明代理学大师:薛瑄》。是书在1993年付梓。第二届薛瑄研讨会的论文集则是在1997年出版的。此外山西地区的主要学术刊物如《晋阳学刊》《山西大学学报》《运城师专学报》等也陆续刊登了不少研究薛瑄的文章。^③

在讨论薛瑄的理学思想和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时,学者们有两个反复强调的议题。其一是辩驳上引黄宗羲对薛瑄学术的断语。他们认为薛瑄绝对不是简单地“恪守宋人矩矱”。他们主张其理学思想,尤其是“理气观”,是对朱熹有所修正和发展的,甚至还开启了后来罗钦顺(1465—1547)与王廷相(1474—1544)的“气学”。第二个议题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烙印,就

① Chan Wing-Tsit, *The Ch'eng-Chu School of Early M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4-35.

② 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③ 赵北耀:《薛瑄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63-265页。

是他们认为薛瑄思想的性质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①

以李元庆为例,他将薛瑄置于一个明中叶朱熹理学面临危机的脉络下讨论。他认为当时的理学家“继承发扬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传统,掀起了以气本论为中心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但是由于薛瑄“既要从根本上坚持维护朱学正统,又须对它批判改造或修正”,所以是“时代造成薛瑄思想矛盾的重要根由之一”。同时因为薛瑄“一方面不能不从维护朱熹理学的正统地位出发,对朱学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辨析”,而“另一方面,由于不是根本性质的批判改造或否定”,所以“不可能真正克服朱学体系的矛盾,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这些矛盾”。这正是“时代造成薛瑄思想矛盾的又一重要根由”^②。在李元庆的研究框架下,薛瑄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其个人的主体性是不重要的。这个时代所产生的理学家薛瑄既继承朱熹理学的基本立场,又处在明中叶后土木堡时代的变局之中而不得不变,但却无法从根本上突破朱学的藩篱。其结果就是成为一个不是简单坚守宋人理学窠臼的朴实唯物主义论者。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下,只有对时代背景的抽象描述才具备和一个个体的思想内容产生因果关系的条件。因此该个体的主体性与具体生活空间,以及其对不同社会生活的举措和回应等无不缺席了。

研究薛瑄思想的主要文献是其《读书录》和《读书续录》。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处理过薛瑄的“道统观”和“复性论”。^③ 其中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特别留意薛瑄思想本身的发展变化。所以在处理他于中年和晚年两个不同人生阶段的读书心得时,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我从《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中得出了薛瑄的“道统观”和“复性论”是平行发展,而且到晚年方臻至成熟的结论。^④ 简单地说,由于薛瑄没有任何哲学专著或者为任何儒家经

① 例如: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第6—7、128—220页;谷方:《论薛瑄哲学的基本特征》,《运城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15—21、59页;郭润伟:《薛瑄和程朱道学的终结》,《晋阳学刊》1988年第5期,第58—62页;郭润伟:《薛瑄理学的宗旨》,《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65—67页;姜国柱:《薛瑄的理学思想》,《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第62—69页;李元庆:《薛瑄决非仅仅“恪守宋人矩矱”的理学家:对黄宗羲一条断语的辨析》,《运城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第1—7、13页;蒙培元:《薛瑄哲学思想与程朱理学的演变》,《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第73—78页;宁志荣:《略论薛瑄的理气观》,《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74—77页;魏宗禹:《薛瑄思想特点三论》,《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59—64页;杨宗礼:《薛瑄对朱熹哲学最高范畴“理”的改造》,《运城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54—59页;赵北耀:《薛瑄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运城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60—61页;周庆义:《薛瑄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晋阳学刊》1988年第4期,第76—80页。

② 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第134—139页。

③ 许齐雄:《薛瑄的“道统观”和“复性论”》,《明清史集刊》2007年第9卷,第49—61页。

④ 许齐雄:《薛瑄的“道统观”和“复性论”》,《明清史集刊》2007年第9卷,第60页。

典作注,其读书笔记《读书录》和《读书续录》就成为研究他的思想的最佳文献。而《读书录》是薛瑄中年之作。是时他出仕仅三年有余,是录记载了他宦游沅、辰时读书之所得。另一方面,反观《读书续录》则不同。《续录》为薛瑄晚年之作,两录成书年份相去几近三十年。而在这三十年期间,薛瑄的人生历练和学术观点不可能原地踏步、一成不变。在面临诸如大太监王振(?—1449)的迫害而几乎丧命、在无法营救于谦(1398—1457)而对政治越发失望、在体验了从负责一方学政到主持大理寺到入阁而来的种种政治经验等等之后,他的思想自然会产生变化。更何况没有人有任何理由主张其理学思想在中年时已经定型。^①

在讨论薛瑄的理学思想时,最常为学者引述的就是其以“日光飞鸟”比喻理气的聚散问题之一条。按薛瑄的说法:

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鸟飞而日光虽不离其背,实未尝与之俱往,而有间断之处;亦犹气动而理虽未尝与之暂离,实未尝与之俱尽而有灭息之时。“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于此可见。^②

薛瑄将理比喻为日光,而气则是飞鸟。日光虽然由飞鸟所背载,但是两者之间毕竟还不是同一事物。而且飞鸟飞逝如同气散,日光却未尝与之俱尽,所以理还是理。薛瑄以此喻说明朱熹有关理无聚散而气有聚散的主张。黄宗羲就认为这样的比喻不妥当。他认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若无飞鸟而有日光,亦可无日光而有飞鸟,不可为喻。”更重要的是,“盖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气无穷尽,理无穷尽,不特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气为方来之气,亦不以已往之理为方来之理,不特气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③

黄宗羲的批评自然是建立在不同理学传统的基础上而发的。但是也因为这个比喻被黄宗羲直接引述,所以就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注意。^④李元庆在讨论薛瑄的“理气无缝隙”的理气观时,也指出了薛瑄“以日光与飞鸟等为

① Koh Khee Heong, *A Northern Alternative: 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pp. 33-40.

② 薛瑄:《读书录》,《薛瑄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5页。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卷,第3a页。

④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对薛瑄理学提出批评时,还引述了薛瑄另一个将理比喻为物、心比喻为镜的说法。为了行文的流畅,故于此省略。见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卷,第3a—4b页。

喻,反复进行了论证”。^①除了这个著名的比喻外,李元庆也罗列了其他一些相关的比喻,为了说明“薛瑄理气观的矛盾和不彻底性”,因为“他明确主张理气相即无缝隙的同时,却又重复朱熹的说法”,强调“气载理,理乘气”和“气有聚散,理无聚散”等命题。^②

事情的关键在于,李元庆无论是在重构薛瑄理学中的理气相即或者矛盾的聚散问题时,并不区分《读书录》和《读书续录》。所以为了力证薛瑄不是简单恪守朱熹学说,他引用了17条《读书录》的记录和8条《读书续录》的说法。^③而在讨论薛瑄视理、道、太极为“万古永恒的绝对和先于万物的主宰”时,各从两书中引述了10条资料。^④接着笔锋一转批评上引薛瑄的矛盾和不彻底性时,所引日光飞鸟等5条比喻,则均出自《读书录》。^⑤

实际上如果善加利用《读书录》和《读书续录》,反而更可以整理出薛瑄理学思想中对理的统一性的追求脉络。我在拙作中对薛瑄理学思想中的理气聚散、先后,以及相关的道器等问题进行分析,结论是在《读书录》与《读书续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器问题的一贯性。另一方面,在理气的先后问题上,到了《读书续录》时,只见“理与气一时具有,不可分先后。若无气,理定无止泊处”或“理气真实不可分先后”之类的简短笔记。^⑥而在理气的聚散问题上,《读书续录》基本上不再讨论,遑论出现诸如在《读书录》里薛瑄试图通过自己的比喻去解释理气聚散问题的尝试。^⑦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薛瑄研究著作中,学者们在引述薛瑄的思想时,无不将《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一视同仁。换言之,只要是有利于自己之论证的,学者们便自由地从两书中引用薛瑄的话语,而且并没有意识到两书应该分别处理。从我的角度来看,理气聚散说是中年薛瑄的看法,他认真地对待“理无聚散,气有聚散”的命题,所以多方比喻说明之。但是这个议题到了老年薛瑄书写和编辑《读书续录》时就已经放弃了。相反地,他对道器问题和理气先后议题的看法是高度一贯的。而这个发展脉络,加上到了《读书续录》中才正式提出的复性说,正反映了薛瑄理学思想的成熟过程。

① 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第156页。

② 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第155—156页。

③ 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第141—144页。

④ 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第153—155页。

⑤ 李元庆:《明代理学大师:薛瑄》,第155—156页。

⑥ 薛瑄:《读书续录》,《薛瑄全集》,第1324、1329页。

⑦ Koh Khee Heong, *A Northern Alternative: 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 pp. 48—54.